

发现隐秘的自己

□陈 鹏

每个人都有秘密。有的秘密能说,有的秘密只能烂在肚里。写作,无疑在探究那些不便言说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的人生秘密。

写小说差不多20年,刚开始,以为天马行空地构思并完成一个令人惊奇的好故事才算小说家之要务。这些年来,我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离谱——故事永远是《故事会》,电影和连续剧的强项,小说家非要跟强势的大众传媒死磕,无异自取其辱,那么,小说家的要务到底何在? 远离19世纪小说深谙的故事传统之后,小说家又能何为? 我喜欢爱尔兰作家托宾的一句话: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故事背面不为人知的东西,甚至是故事之外的停顿与空白……因为,那些地方往往才包含令人惊讶的人生秘密。马原的说法更直白:“好小说是不可言说的。”

这是我最近两三年一直努力的方向——讲一个故事远远不够,或者,小说真的可以不讲故事,甚至,小说开始的地方正是故事结束或没有故事的地方,犹如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电影中无处不在的长长的空镜头;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老博尔赫斯那些故弄玄虚的精妙故事身后以及卡佛那些伤心神秘的多舛经历的背面,才是小说的理想居所。这些空白之处如此诱人,当你突然读到“天空一下子晴了”,“他们都离开了,把他独自留在空荡荡的房间”之类的句子,我总是禁不住为之动容,我想,这或许正因为那个厉害的小说家突然撕开了生活的缝隙,让我们得以窥探(遐想)生活背面的秘密及生活的种种可能性。换言之,是人性和人心的幽暗和隐秘吸引了我们,而不是太阳垂直照射的高光部分。历来大师都是处理幽暗和秘密的高手:契诃夫、鲁迅、门罗、奥康纳、奥布莱恩……我们如今读到的绝大多数国产小说缺失的,正是这些不可言说的部分;如果人生的拼图必须有光点和阴影,那么,我们对阴影的体察和觉悟,也即对人生秘密的疑惑和追问,还是太少太少了。

我和我的同行,必须在这方面狠下苦功。

自2014年开始,我有意识地开写两个短篇系列,一是以我现在效力的一支业余足球队为蓝本的《野球时代》,二是我十余年记者生涯为基础的《记者手记》;前者,我任意放开想象,专业足球运动员出身的我对此轻车熟路,后者,这么多采访素材值得我用虚构和荒诞(这很考验想象力)对抗愈加荒诞的现实。无论它们多么不同,我总想写出故事背后的秘密——那些无奈、心酸却又不得不为此挣扎拼搏并捍卫尊严,那些不可言说的言说,那些无法说得更多的沉默,那些关于中年男女们也许是永恒的荣耀、耻辱和无奈——这些无奈不是基于性格的,甚至不是基于生活的,而是基于他们(包括我)也难以洞察的神秘阴影,无法摆脱的轮回宿命。因此,我像个无力的家伙,和我笔下的人物颇多共鸣,常常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与出口。不,找到答案不是一个小说家该干的,除非他写的是侦探小说。

感谢小说,感谢写作,这么多年来的坚持告诉我一个真理——写作者的惟一义务只能是写作,通过写作才有望发现我们自身,发现隐秘的自己;面对一个娱乐化、碎片化相当严重的时代,写作根本无用,却又如此有力,它带我们返回那些隐秘的生活内部,让我们清楚自己的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工作像写作这样带给我们如此之多呢? 我想,每一个写作者心里其实都清楚自己为何写作,对此笃定而坚持,大概就是意义之所在吧。

衷心感谢每一个读我小说的朋友。

阅读陈鹏,令人惊讶的首先不是叙事技艺,而是他的小说通过这些叙事技艺所展开的世界,一个围绕在我们身边却又显得无比遥远的生活世界。小说将那些与我们共在却又处于偏远的社会角落里的人群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给予他们自己的声音,给予他们自身的形象:心灰意冷的社会小报记者,失意的足球运动员,小生意人,下岗工人,居无定所的打工者,事故伤残者,杀人犯……陈鹏赋予他们生命的内在性,展现出他们微不足道却难以实现的生活期待、尊严与爱,他们无力承担的痛苦、折磨与恐惧,以及那些左右着他们并在他们身上显示出暴力特征的无可抗拒的结构性力量。但是陈鹏的写作并不归属于旨在塑造人物或人物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范畴。在这些人与事情各异的小说中,明显存在着一种人物的谱系,存在着事件的系列性,这是一种不同于“性格”与“典型”的社会属性,它几乎就是一种当代新闻叙事的特质。然而陈鹏小说则将一种对新闻调查的模拟或对新闻报道的戏仿发展成一种人类学调查式的叙事,并将新闻调查与人类学叙述融进一种侦探式的叙事悬念,揭示出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态、言行特性、犯罪习俗及其人类意识活动的各种封闭性,陈鹏小说将不动声色的社会学批判隐含于人类学的观察之中,描绘出一幅文学人类学式的社会景观。

——

通常而言,“调查”是陈鹏小说的展开方式也是叙事悬念之所在。事实上,无论司法与新闻的状况如何,司法调查与新闻调查已是最触动这个时代的敏感神经的话语。标识为“记者手记”的几篇作品,是新闻调查及其随之展开的故事与叙述话语。仅就其化用新闻调查形式而言,不能不说陈鹏在叙述话语及其悬念设置上的时代敏感性。

除了“记者手记”之外,在《第56个》《车位》等作品中,则是小说中的当事人充当了自身遭遇的调查者及叙述者。曾经身为新华社记者的陈鹏在小说中绝不是对新闻调查的一种简单模仿,而是对新闻调查的戏拟与反讽。现场调查、分析、推论,探究疑窦丛生的事件,在他的小说里总是遭遇到一种经验性的嘲讽。调查是对调查者的讽刺,事实是对事实感的嘲弄,推论是对推论逻辑的颠覆。《车位》中的李果对他的“停车权”及其车子屡遭毁坏事件的个人调查毫无结果,为了让他 的遭遇被电视台关注,他自己制造了一次车子擦划事件,这成为物业管理者证明他患有精神病的证据;结婚7年没有生孩子的妻子刘盐,对卖水果小贩的小儿麻痹症孩子“失踪”事实的观察和分析,被人们视为疯子,最终这对夫妇被送进精神病院。当他们没有遵从社会习俗或藏起对世界的冷漠,并企图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时在周遭人们眼里就是一种发疯。

陈鹏小说中总是有着超额的经验、悬念与线索,超量的意识提醒与无意识暗示,过多的情节

■印 象

痴心者陈鹏

□马 原

居于西南一隅的陈鹏,在小说式微的今天依然痴心于小说,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异数。

说他痴心绝不为过。首先,陈鹏对写小说这件事的热衷,远不如小说本身对他的吸引力更大。写作本身自有一种魔力,我自己就深受其困扰而无可自拔,许多小说家同行都是类似的情形,但是陈鹏不同。相比小说本身,他对写的热情要远远逊色许多;换一种说法:他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甚至可以不写,但他的生命里绝对不可以没有小说这个东西。小说是他的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写小说已经差不多20年了!无论他当时的职业是什么,是学生还是专业足球运动员;是记者还是新闻官,他都一直在写从无到极。持之以恆为一桩事情凡数千日之久已经很说明他的痴迷程度了。可为什么又说他可以少写甚至可以不写呢?因为他自己选择了另外一条与写小说相悖的路——做职业小说编辑。对于一个有志于写小说的人来说,没有比小说编辑更危险的职业了,因为它最终会断送你的写作前程。

陈鹏现下是某文学杂志的掌门人,主编。陈鹏主编,是他的自我选择。他还年轻,至今尚未摸到不惑之年的门槛,所以他这个主编尚不具备挂名的资历。陈鹏主编诸事必得亲为亲历,偷不得懒也偷不得闲。最令我唏嘘不已的是他这一次职业转换,薪酬不高而付出的心血是从前数倍之多!

前面说了,他已经写了20年小说。20年专心做一件事,即使资质平平也会成为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甚或是专家大专家。而小说家是百业百行中对个人能力要求最高的,资质平平者绝不能为。所以首先陈鹏一定会是个成熟的小说家了,如果不是他也就早改换门庭了。这个行当中滥竽充数是很难的,尤其在年富力强之际。而且这个年代选择这么多,谁也不会只盯住一棵树去吊死。

陈鹏早已经在小说这个行当中站稳了脚跟,且用一部又一部佳作展示出实力。他是当下中国实力派小说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以此为契机,他才有机缘由媒体官变身为一家人文学杂志的主编。也可以这样说:陈鹏是因了其在小说领域的卓越才能被选中为主编的。

《绝杀》这本书便是明证。

这本书中的篇什对一本小说家总体才能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检阅。对于有经验的读家,一本小说集的标题目录是小说作者给你的第一印象。

应该说这个印象相当深刻。究其原因,其中字数最多的标

题《一桩事后张扬的谋杀》起到关键性作用。首先它与小说史上 的一个巨人有关,伟大的马尔克斯以及同样伟大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先与后,一字之差!用大师前辈的标题作底,稍作变换以自用,足显作为后生晚辈的底气是何等足!

倘若陈鹏是一个新手,我马上可以断定他不知天高地厚。他不是。但凡聪颖的写家都不会着意沾大家名著的边,沾边摆明了沾光的意图,所说的“黄酱落到裤裆上,不是屎也是屎”。写家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没有谁会主动沾这个边。除非他有百分之百的自信,有自负般的自信。譬如前有奥维德的《变形记》,再有卡夫卡的《变形记》,韩东胆敢又写《知青变形记》肯定是基于十二分的自信心。所以陈鹏这家伙一定有一个大心脏,或者像俗话说说的吃了豹子胆。平心而论,韩东做得非常之好。

陈鹏也不错。为生活叙事的多样性还是节奏的把控都显示了非凡的才能;一个如此复杂的结构被从容而且流畅的演绎,几乎没有丝毫破绽可循。一个几近完美的复杂叙事的蓝本,一个可以与安东尼奥尼电影相比照的小说佳作。

我自己更喜好陈鹏另外一些写身边生活的作品,《云破处》《不准掉头》《昆明西区》《去越南》这些,其中可以像观影一样体味今天都市生活的气息,甚至于嗅到王重李果们的汗味屁味,葛云峰孙孟老郭们的往来穿梭,尹影毛毛小云们的任性和矫情,故事和人物忽然有了质感,有了之外的弹性和多义。读陈鹏的小说,你会不由自主地喜欢其中的人物,甚至会喜欢上写这些故事中的那个人。因为那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会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同时你会离开故事去联想或者陷入冥想,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一次全过程的神秘阅读体验。

我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小说人,一生都在读小说写小说聊小说,以小说的方式破解人的奥秘、世界的奥秘、宇宙的奥秘。我最看重的是有慧根的懂小说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令我开心和感动,令我的一天24小时充实而有意义;陈鹏正是这样的朋友。

前面说到他也许那一天会不再写小说,但是他离不开小说,说小说是他的命,这话不是白说的。几个月前的某一天,他老婆在昆明家里待产,他却在丽江古城与一众同行朋友为小说发病发烧。老婆忽然进了医院,他才记起自己马上要当爹的现实,风火兼程赶到昆明的医院里。那一天果然是他当爹的日子,是他儿子的诞辰日。

一个小秘密:那天那个新生儿在派出所正式注册的姓名——陈小说。

以你的标准,陈鹏对小说够痴心吗?

构及其代理人的功能倒置了过来,人必须听命并服从它的意志。这是一种关闭了公共空间的特殊机制,一种非社会化的机构。就像在前现代社会的民间故事中一样,当人们陷入无助时,鬼魂就作为死不瞑目的“正义”诉求出现了。

冤死的鬼魂对新闻调查的论述充满悱恻,但又透彻世故。在民众眼里,新闻报道或许是他们救命的一根稻草,新闻调查与报道所产生的公共舆论是孤独的个体惟一能够指望的社会联系。自由传播的新闻是对专断和错误使用权力的监督,但在“记者手记”系列中,以及在《车位》中,人们心目中的新闻是在一个人类社会关系解体之后,唤起一种临时关注的方式。

鬼魂眼中的逻辑是清楚的,为着目的可以颠倒是非,可以牺牲真相,这是对新闻调查的嘲弄。对于权力而言,对于渴望从权力那里得到一些利益或好处的人们而言,献媚比批评更有效。不惟《后所》中的鬼魂如此,《乌蒙》中的小店主对待记者的态度也是实用的,为了索回乡政府拖欠他的钱,他把记者的报道当作随意打发的工具而非求助于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调查结果。这是无权者的世故与狡诈,无权者的聪明才智,无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游戏。

四

在陈鹏的小说中,底层社会的人们或穷人恢复了个体生存的经验具体性,但却并不是对个性的塑造。对个体生存来说,社会联系的解体而非个性问题构成了个人生存的巨大困境。毫无疑问,如果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个性没有那么重要,它在小说中也不会重要;如果社会场所及其势能变得更具有重要性,这些问题也将在敏感的小说家笔下日益重要起来。

事实上,人与社会之间的合法联系解体之际,保持个性痕迹或心理差异的人物往往更加不幸,《溺美》中自杀的母亲的道德困境,她笃信基督教却因儿子是杀人犯被赶出教堂,基督教社群是她惟一的归属地,也是她仅有的社会联系,但其他信徒却没有把这个连文夫一片指甲也没有留下的妇女的处境体察为一种道德困境,她的自杀正是对难以承受的社会遗弃的抗议,也是这个无情世界里残余的人性。《低地》中想从社会暴力关系中退场的武钢,最终他被对手也被足球队同伴和他的女友要求成为一个“男人”,即一个能够忍受和接受暴力的人,人们会允许他曾经是暴力的,但不允许他背叛暴力逻辑;所谓的男子气不过是一种适应残酷社会场所并变得与这个环境一样残酷而已。

在陈鹏小说中,在个人与社会联系的解体这一语境中,在每个孤独的人心底,时常闪烁着对小型社群或小型社团的渴望,它所投射的社会理想是人与人、人与小型社会处在一种值得信赖的伙伴关系中。但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渴望,《半生》中的面临下岗处境的工人之间的社会性联系

□耿占春

或共同体意识瞬间就会解体。

就像陈鹏从不简化任何一种社会传所的复杂性,他也从不省略故事焦点之外的细枝末节,在涉及底层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时,他总是能够让我们注意到,仅仅活得卑微还不够,还要有人性的残余部分,甚至是艺术天分的残余部分,人的屈辱才是人性的屈辱。正像《半生》中所描写的,面临下岗的工人们的业余时间还是文艺的,但一种职业、一种脆弱的社会关系在行将解体之际,这些品性或个性已经不再能够成为爱人或被爱的能力的体现,不再能够吸引他人。事实上在《半生》中,除了下岗面临着个体谋生的恐慌之外,是人们失去社群感的内心恐慌。

城市与乡村距离不断加大,当城市以空间功能的分割即以居住、入学、消费等将贫富分割开来,人们大大减少了与全然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他人的相遇。陈鹏将他们恢复为一种社会化的生活形象,这也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包含着社会场所的群体形象,虽然像小说中一样,他们难免与失业下岗、暴力犯罪、无家可归之类的流动性生活脱不了干系,然而他们不再是令人恐惧、厌恶、躲避的对象,被小说赋予了个人情感,被赋予了生活感受,尽管一些人苦不堪言,穷困、疾病、没有尊严,但他们身上依然残余着爱、行善和关心他人的能力。

我们得感谢陈鹏这样的作家,把观察的焦点给予那些偏远地域或底层的社会场所,将可见性赋予那些没有身份的人们。小说并非无端地被视为“人类仁慈的典范”:对他人的内心生活缺乏体察,对他们实际生活的无知与偏见降低了人们对他人处境的同情。小说仍然是恢复我们对他人经验的感同身受的一种无可替代的形式,是我们进入他人内心生活的一种途径。

在我不断地写出这些之后,依然感觉陈鹏小说世界的主题繁复得令人迷惑:他是在一个充斥暴力的凶险世界里探索剩余的人性? 生活的安全感却指望不上这些剩余物;他是在描述一个谎言支配的世界? 没有任何东西人们能够信任,包括我们的认知;他是在讲述一个没有理性的社会里一个人企图运用理性的荒诞? 一个布满陷阱、暴力、冷漠的迷宫,而每个陷进去的人似乎都参与了迷宫的布局;他在呈现人与人没有关系的社会状况? 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的真实联系都被看不见的手机解除了,但每个人都难逃暴力,一切都玩着在场的不在场,玩着关系的缺席游戏;他在描述一个溃败的现代社会? 人们从未抵达他们的个体化目标,置身于无所不在的控制体系却又缺乏真实的社群感……或许正是因为生活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人们才需要一种文学人类学式的小说,需要重返这一“失落的天堂”。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